

邓小林 著

民国时期国立大学
教师聘任之研究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Http://press.swjtu.edu.cn](http://press.swjtu.edu.cn)

历史学

民国时期国立大学

教师聘任之研究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基金资助

民国时期国立大学 教师聘任之研究

邓小林 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 成都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民国时期国立大学教师聘任之研究 / 邓小林著.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7.5
ISBN 978-7-81104-633-5

I. 民… II. 邓… III. 高等学校—教师—聘用—研究—
中国—民国 IV. G64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63257 号

民国时期国立大学教师聘任之研究

邓小林 著

责任编辑	郭发仔
封面设计	本格设计
出版发行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成都二环路北一段 111 号)
发行部电话	028-87600564 028-87600533
邮 编	610031
网 址	http://press.swjtu.edu.cn
印 刷	西南交通大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40 mm×203 mm
印 张	9.062 5
字 数	228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04-633-5
定 价	26.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8-87600562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二章 近代大学教师聘任的历史渊源	21
第一节 近代欧美、日本大学的教师聘任	22
第二节 清末中国大学的教师聘任 ——以京师大学堂为例	33
第三章 北洋时期国立大学的教师聘任	48
第一节 国立大学教师聘任的制度规范	50
第二节 早期国立大学的教师聘任 ——以北京大学等为例	74
第三节 地方性国立大学的教师聘任——以国立成都大学、 广东大学等为例	95
第四章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立大学的教师聘任	109
第一节 国立大学教师聘任的制度规范	112
第二节 国立大学的教师聘任 ——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为例	127
第三节 国立与省立大学教师聘任的同与异 ——以国立四川大学和省立重庆大学为例	146
第五章 国立大学教师聘任的几个问题	172
第一节 教师聘任中的非制度性因素	173

第二节 “本土派”之重与“海归派”之强	186
第三节 教学、科研与聘任之关系	201
第六章 国立大学教师聘任与近代大学教育和 学术之发展	210
结 语	224
附 录	227
附 表	264
参考文献	267
后 记	285

第一章 绪 论

一、选题缘起

在一所大学的构成要素中,师资力量尤为关键。梅贻琦先生在任清华大学校长之初曾言道:“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们的智识,固有赖于教授的教导、指点,就是我们的精神修养,亦全赖有教授的‘*inspiration*’。”^①这表明教师在大学各资源构成中居于首要地位。近代著名教育家雷沛鸿先生在阐释“什么是构成大学‘大’的要素”这一问题时,也曾说到大学具体作用的发挥正是依赖大学教师来完成的。^②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在任浙江大学校长时亦说:“一个学校实施教育的要素,最重要的不外乎教授的人选、图书仪器等设备和校舍建筑。这三者之中,教授人选的充实,最为重要。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③此话意之所指与前二者并无什么实质区别。延聘优秀的师资是他们共同的目标。

曾为哈佛大学校长的科南特曾说:“大学的荣誉不在于其校

① 梅贻琦:《接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就职演说》,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341号),1931年12月4日。

② 雷沛鸿:《什么是构成大学‘大’的要素》,教育导报,1946,1(9)。

③ 竺可桢:《大学教育之主要方针》,国立浙江大学校刊,1936(248)。

舍和人数，而在于它一代一代教师的质量。”^① 这说明，在重视师资的问题上，中外教育家是有共识的。

教师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其能教导知识、激励精神修养以及给学校带来荣誉，而且某些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也与能够聘得一批学养较高的教授或学者关联紧密。因此，从制度与实践等层面对近代中国大学教师聘任这一现象进行勾勒与分析，对于理解近代中国大学教育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此外，因近代中国大学本身即为舶来品，其教师之聘任明显地带有学习西方的痕迹，因而对此现象进行钩沉，对于帮助我们理解近代西方大学教育对中国的影响也不无裨益。

在既存研究中，虽然近代大学教育制度和大学人物较多地成为人们关注的重心，但本与教育制度关联密切的大学教师聘任等内容，却并未见有深入和系统的研究。其中缘由，笔者认为，一是可能因为史料零散、不足而难以收集齐全所致；二是包括大学教育史在内的整个高等教育史本身尚处于渐成一个研究领域的过程之中，其中值得反复探讨与开拓之处不少，作为问题之一的大学教师聘任亦可能为研究者所忽略。

国内包括大学教育史在内的教育史整体研究起步都比较晚，在具体研究过程中还存在着主客观方面的困难，笔者在收集与梳理相关资料的时候亦甚感吃力。文献资料对近代国立大学教师聘任的制度规范与实际操作记载本不甚多，且论述零星。那么，这一问题是否还有深入展开或细致研究的可能呢？著者在阅读相关书籍和文献资料时发现，尽管涉及这一主题的资料并不是十分丰富，但是既存研究对材料的使用也并不充分。如果仔细梳理、分析这些材料并加以合理运用，则实际上构成这一主题的材料基础足矣。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台湾一些学者以大学为中心，突破传统大学校史的诠释方式对大学进行的重新考察，曾给该领

① 陶爱珠：《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域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并至今影响甚深。这说明，换一个切入视角或一种叙事方式，亦可能将研究深入下去。

将本著研究对象定为民国时期国立大学教师的聘任，主要理由是：首先，就近代中国大学的发展历史来看，清末民初仅是近代中国国立大学创建和萌芽阶段，国立大学教师聘任的制度规范与实践操作也只初显端倪。民国建立至抗日战争结束前后，近代中国大学处于逐渐发展和步入成熟时期，中国大学教师聘任也随之呈现制度化、法制化与操作多元化并存的局面。选择这一“时段”，自然也就最能显现近代中国国立大学聘任的发展轨迹。其次，以近代国立大学教师聘任在制度规范、实际操作等方面为探讨重点，主要是因为与省立和私立等大学相比，国立大学在一定程度上与国家政策关联更为密切，能更详细地反映近代大学教师聘任政策之发展轨迹。而且，就民国时期政府对各类型大学之态度来看，国立大学是其发展的重中之重。因此，以国立大学为例进行探讨，更具典型意义。

近年来，我国大学教育和大学人事改革朝纵深方向发展，其中收获颇多，但所存问题亦不少。自然，民国时期中国国立大学的教师聘任需要我们深刻反思的地方很多，不过，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之处也同样不少。尽管“当年的气象已经成为历史”，而且“此后，我国的高等教育又经过半个世纪的学习、建设和发展，经历了跃进和僵滞、动乱，以及拨乱反正、恢复重建和改革开放的曲折过程”，此间“我们的成就不可谓不伟大”，但是，“教训也不可谓不惨痛”。^①因此，“知古鉴今”就尤为必要。

二、学术回顾

虽然“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研究伴随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产生

^① 杨东平主编：《大学精神》，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而发轫，并伴随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演进而得以逐步发展”，^①而且西方近代意义上的大学在中国出现以后也有一些关于大学教育方面的研究，但是，关于大学教师聘任问题却并未立刻引起时人的注意。康有为的《大同书》之“大学院”专章，可以说是西方近代意义上的大学在中国创建时国内较早论述大学内容的文章。其虽对大学的含义和“大同”时代大学制度有所设想，但是根本没有论及大学教师聘任问题。而且，康有为之“大学”概念与其时在中国已经出现的大学也不无差异。^②与此时间相堪，1909年创刊于上海的教育类专业杂志如《教育杂志》等所刊登的大学教育类的文章，也多为介绍外国的大学教育。因而，虽然清末民初关注或介绍国内外大学的著述与文章都有一些，但是，那也仅仅表明整个中国近代大学教育研究刚刚起步而已。

民国初年，早期留学海外攻读教育类的留学生亦先后回国，并带来了新的教育思想和理念。他们创办了一些教育类刊物，并刊登了不少论述大学教育问题的文章。例如，1919年由蒋梦麟担任主编的《新教育》即在创刊后就刊载了一定数量的关于大学教育的文章，参与编辑的人物不乏当时教育界名人，如蒋梦麟、蔡元培、胡适等，正可谓兵强马壮。但是，其所刊登的文章与论列的内容，并未见有专事阐述其时中国国立大学教师的聘任问题。其他如《东方杂志》、《申报》、《独立评论》、《教育公报》、《教育杂志》等非专业教育和专业教育类杂志所刊发之大学教育类文章情形与《新教育》大致差不多，其对处于日益发展中的近代中国大学的关注重心，主要集中于教育经费、学术独立与学术自由等方面，提及或专门论述当时中国大学教师聘任问题者较少。

据笔者所察，教育专业类杂志《教育杂志》于1924年刊登的“聘约”一文，^③从各级各类学校教师聘任的总体情况出发进行了

① 李均：《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研究史略》，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4（1）：99。

② 康有为：《大同书》，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

③ 陈兼善：《聘约》，教育杂志，第16卷第11号，1924年11月20日。

论述。次年5月,《教育杂志》又刊发了“中国的大学教育”一文,内容涉及近代大学教师聘任和校长选派等事,而其中对于大学聘任教师事尤为注重,对有留洋经历者给予了较多批评。^①窃以为此二文,无论其论述内容多寡和深刻与否,都可谓较早提及大学教师聘任事宜的两篇文章。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随着政治的逐步走向“统一”,中国大学教育亦有了较快发展,对大学教师聘任问题,时人关注就开始慢慢增多。

傅斯年(孟真)在创刊于1932年的《独立评论》上相继发表的“教育崩溃之原因”、“教育改革中几个具体事件”、“改革高等教育几个问题”等文章,就言及大学教师聘任资格的问题。其说道:“中国的教育厅长特别是教育局长可以随便更换,这犹可说他们是政务官,然而厅长、局长竟能随便变更校长,一年数换,于是乎教员也是一年数换了。服务教育界者,朝不保夕,他们又焉得安心教书?又焉得不奔兢,不结党营私?所以政府的责任第一是确定教育经费之独立——中央的及地方的;第二是严格审定校长、教员教授的资格,审定之后,保障他们的地位。”^②因所观察角度不同,对傅之观点,主要是“教育崩溃之原因”所论,也有学者曾予以了反驳。^③

继上述文章之后,《独立评论》又间断性地发表了一些文章,对大学教师聘任和保障教师权益等问题持续注视。^④因此可以说,

① 华林一:《中国的大学教育》,教育杂志,第17卷第5号,1925年5月20日。

② 傅斯年的这几篇文章,分别见《独立评论》1932年第9号、第10号、第14号。也可见后文之详述。

③ 《独立评论》,1932年第11号。“通信”,即1932年7月18日邱椿写给胡适的信。

④ 除正文中已经提及的傅斯年与邱椿的论述以外,《独立评论》还有一些文章或多或少地对大学教师资格问题作过评论。例如,旭生:《教育罪言》(一),《独立评论》第25号;蒋廷黻:《中国社会科学的前途》,《独立评论》第29号;孙学悟:《提倡自然科学的几件急务》,《独立评论》第34号;吴有训:《学术独立工作与留学考试》,《独立评论》第151号;王伏雄:《合并国立大学刍议》,《独立评论》第158号;涛鸣:《哈佛大学三百周年纪念》,《独立评论》第220号等文章。

《独立评论》是当时刊登与本著主题有密切关系的较多文章的非教育专业类刊物。

除国人对大学教师聘任中存在的问题有所揭露和批评外，1931年9月，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来到中国，对中国各级教育状况进行了为期三个月左右的考察后，对此问题也有所论。“中国所谓‘教授’二字，除使人联想其荣誉及较高之薪金而外，常不易确定其正确之意义。不论国立或省立大学聘请教授之条件，政府既无规定，而一般习惯又无可遵循，故实际上各大学彼此相异。就一般而论，教授皆由各大学校长自行聘任；讲师及助教，则由系主任征校长同意聘请之，亦有不征校长同意者。”尽管考察团所言并非全是事实（如民初乃至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不久，教育部所颁大学相关法律、法令对教师聘任及其资格条件就有了明文规范，而并不是没有规定），但是考察团最后所言，则明确指出了各大学在聘任教师时并不一致的特点。对此，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还提出了一种解决办法：“国立高级学校（指大学及专门学院）之校长及教授，应根据一特种大学委员会之推荐（将来即根据大学团体之推荐），由教育部长任命。”^①

在微观成果方面，虽然也还有另外一些文章从不同侧面程度不一地对大学教师聘任有所揭示，但所揭示的内容皆不多。

从大学教育史角度看，从民国初年到1949年间，宏观研究方面即著述数量似乎不少。其中既有本国学者的直接研究成果，也有一些翻译作品，如孟承宪的《大学教育》、王觉源编著的《战时全国各大学鸟瞰》、董任坚之《大学教育论丛》、郑若谷译就的美国人威尔铿斯著作《大学教育新论》、许孟瀛译述的英人 Adolf

① 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十一辑》，中国台湾文海出版社1989年版，第52～168页。

Lowe 所著《演变中之大学教育》，等等。^①与此同时，通史性的教育类著作，专门论述某一个或某几个时期教育制度、教育思想、学校制度的著作，或者专论近代高等教育史的著作也出版了不少。^②但是，就著者浅陋所见，所有这些著述几乎都没有专门论述大学教师聘任事宜的内容。

据此，著者认为，以研究状态与成果为标准划分，从清末民初到 1949 年间可为进行近代大学教师聘任研究的“萌芽时期”。

① 孟承完：《大学教育》，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3 年版；王觉源：《战时全国各大学鸟瞰》，重庆独立出版社 1941 年版；董任坚：《大学教育论丛》，上海新月书店 1932 年版；[美]威尔铿斯：《大学教育新论》，郑若谷译，北平著者书店 1932 年版；[英]Adolf Lowe：《演变中之大学教育》，许孟藏译，重庆商务印书馆 1945 年版。笔者在正文中所举仅为论述大学教育的著作中一极小部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北京大学历史系合编：《中国史学论文索引》（第一编，下册），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269～285 页，从“教育史、教育思想、学校制度史（附书院、留学）、考试制度史（附科举）、教育概况与观察报告、体育文娱”几个方面，对 20 世纪初（1902 年开始）到 20 世纪 30 年代发表在非教育专业类刊物如《太白》、《雅言》、《艺观》、《逸经》、《民权素》、《大中华》、《努力》、《北强》、《春潮》、《华国》、《东方杂志》等以及教育专业类刊物如《新教育》、《中华教育界》、《教育公报》、《教育杂志》、《教育学报》、《平民教育》等上的关于各类教育研究或报告性文章都作过统计。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中国史学论文索引》（第二编，下册），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377～407 页，从“教育史、体育文娱”等七个方面对 20 世纪 30 年代末至 20 世纪 40 年代末有关各级各类教育的文章也都详细列致。综观上二书所有涉及高等教育、大学教育或者教育史的研究成果，其中虽不乏有许多直接与大学（教育）有密切关系的研究，如论述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国立南开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国立中山大学、国立河南大学等大学的文章，但是就其内容来看，与本著主题论述相关者也几乎未见。

② 据笔者初略统计，自 1915 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李步青著（新制）《教育史》（师范学校适用）教育类通史著作以来，教育类通史著作、教育类断代史著作、教育类专门史（如专论教育制度、教育思想、教育哲学、学校制度等）著作、高等教育史著作、大学教育著作等，至少有数百种之多。具体情况可参阅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教育·体育》，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5 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编：《七十六年史学书目：1900—197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323～328 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八十年来史学书目：1900—198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425～430 页，也分别从“中国教育史”与“世界教育史”两个大方面对相关著作成果作了统计。此中，教育通史性著述较多，直接论述近代中国大学教育的著作虽然也有，但是对本著主题涉及者同样是少之又少。

其关注的重点，主要在于对大学聘任教师时所产生的一些现象如注重洋文凭、资格不够等进行了评论。

1949年以后，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新教育制度、政策的实施，我国教育发展步入了新的时期。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整个教育史的研究呈现出一派新的气象。相比较而言，体现在论文或文章上的微观研究方面，成果较多，而研究领域则有教育思想史、学校制度、教师个人与群体、书院、留学生等。宏观研究方面，虽然也有高等教育史、教育通史性的著述出现，但是为数较少，且多是对教育制度、教育思想、教育机构、教育人物的大致研究，研究方法与所论内容都比较粗疏。就笔者所见，无论是微观研究还是宏观研究，无论是高等教育史研究还是大学教育史研究，虽然有有关大学、大学人物如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等的叙述，但是对近代中国大学教师聘任这一问题基本未曾涉及。20世纪60年代后期，随着“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开展，社会秩序从常态逸出并渐入乱境，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各个方面的研究日形涣散并逐渐停滞，当然就更谈不上任何有对本著主题有所关注的研究成果。^①因而，如果从整体上看的话，从1940年以后到20世纪70年代末，对近代中国大学教师聘任问题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据此，著者亦将这一时段称之为“停滞时期”。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研究逐渐形成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史学界对于近代中国大学及其教育中一些问题的关注亦随之增多。其中，关涉民国时期大学教师聘任等事宜的论述，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一是体现在一些教育通史性或断代史著述中。这可以李华兴

① 关于这一时期的微观研究成果与宏观研究成果的大致状况，可以详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中国史学论文索引》（第三编，中册），中华书局1995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七十六年史学书目：1900—197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八十年来史学书目：1900—198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等等。

主编的《民国教育史》与李国钧、王炳照任总主编，于述胜所著的《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七卷为代表。李著曾在“师资管理与待遇”、“高等教育”两章中对民国时期有关大学教师聘任问题有大致论述。前者相关内容论述又稍多于后者。^①而于著就教师聘任事也有简略论述：“在教职员及其管理方面，大学设校长1人，总理学校全部事务；各科设学长1人，主持一科事务。设教授、副教授，必要时得延聘讲师。”^②李著对大学教师聘任等问题稍有论及，于著论述还涉及教师薪俸等方面。两部著述虽各有侧重点，但是却都注重当时北京大学的改制和从政府制度规定上进行阐述。

二是体现在专门以大学为研究对象的著作中。这方面，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对一些具体大学的研究较为特出。苏云峰与黄福庆的系列著作，则可为其中代表。苏著《抗战前的清华大学，1928—1937：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在不同章节对清华大学教师聘任有或详或略的论述。“初聘教师之出身比较”、“初聘教师之职级比较”、“各学院教师之职级分布”、“教师最高学历及国内外学位关系之统计分析”、“教师出生年龄组及一九二七与一九三七年之年龄分布”、“教师籍贯统计”等六部分

① 李华兴主编：《民国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14～515页。

② 李国钧、王炳照总主编，于述胜著：《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七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3～50页、第90～250页各有叙述。此外，相近内容的一些论述还可见熊明安编著：《中国高等教育史》，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郑登云：《中国高等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刘一凡：《中国当代高等教育史略》，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蔡克勇：《高等教育简史》，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年版；涂又光：《中国高等教育史论的介绍》，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潘懋元主编：《中国高等教育百年》，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张惠明编：《中外高等教育史研究》（论文集），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年代不详；季啸风主编：《中国高等教育变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高奇：《中国高等教育思想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等等。

内容，不仅是以往所有大学或高等教育史著述中没有深入探讨过的，是一个全新的视角，而且也是目前笔者所见以一具体国立大学教师群体为研究对象，分析教师初聘状况最为详尽的。^①此外，苏云峰还在其《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私立海南大学，1947—1950：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三（两）江师范学堂：南京大学的前身，1903—1911》等著述中对教师聘任有过一些论述。^②

何炳棣曾为苏著《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一书作“序言”，他在其中说道：“苏云峰教授二十余年心血结晶的前半部——《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是近年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杰出专刊之一。此书不但对清华创校的中美外交档案、（中国）台湾、（祖国）大陆及美国有关早期清华经费、体制、领导、政策、师资、图书、学生素质和生活片面的资料的搜集，做了很大的努力，而且全书对早期清华理性平衡的总评价，应该是经得起今后史家的考验的”，“从较狭的专业观点看，此书行将被举世公认为中国近

① 苏云峰：《抗战前的清华大学，1928—1937：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84），2000年。关于包括教师聘任在内的论述，可见苏著第4～8页即第一章“早期清华之回顾”中的“校长、教员和权利冲突”、第35页即第二章“北伐统一与罗家伦出主清华”、第69页即第三章“梅贻琦与清华之发展”、第131～157页即第五章“教师品质之提升”等部分。

② 苏云峰著：《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五章“中美教师素质与差别待遇”；苏云峰著：《私立海南大学，1947—1950：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61），1990年，第六章“正副校长与教职员”；苏云峰著：《三（两）江师范学堂：南京大学的前身，1903—1911》，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82），1998年，第二章“日本教习之延聘、冲突、撤换及其所扮演之角色”、第六章“中国教习的更迭及其出身背景分析”等内容从不同侧面对教师（教习）聘任状况有过叙述。

代教育史上的一部标准著作是可以预卜的。”^①窃以为，这个评价同样适合黄福庆著《国立中山大学，1924—1937：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以下简称《国立中山大学》）一书。仅从著述目录上看，虽没有像苏著那样集中地对大学教师聘任问题进行讨论，但是从分布于各章节的相关内容，仍可见其对这一问题并未忽略。^②

或许受台湾地区研究的影响，近些年来，内地对近代中国大学的研究也逐渐增多。有对近代中国大学进行整体研究的，有对私立大学进行研究的，也有对教会大学进行研究的，还有从政治、社会与文化角度对某一具体国立大学进行研究的。这些研究可谓异彩纷呈，各具特色。在上述各类型研究中，笔者认为金以林的《近代中国大学研究：1895—1949》、《南京国民政府发展大学教育述论》、《大学史话》^③与霍益萍《近代中国的高等教育》等著作对这一问题论述稍多。^④而在金以林的三著中，《近代中国大学研究：1895—1949》的论述最为详尽。

与黄福庆《国立中山大学》有些相似，如仅从金著目录上看，是无法窥见与本著主题相关的论述内容的。作者将政府所颁发的一些法律、法令以及对于某些具体大学如北京大学等的教师聘任也是分散在不同的时间段里加以论述的。

① 苏云峰著：《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何炳棣序”第1页。

② 黄福庆著：《国立中山大学，1924—1937：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56），1988年，第38～91页，第二章“学校组织”与第三章“校长的更迭”等章节。

③ 金以林：《近代中国大学研究：1895—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金以林著：《南京国民政府发展大学教育述论》，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1999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金以林、丁双平：《大学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④ 霍益萍著：《近代中国的高等教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